

雍 同

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率的长期因素

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率、积累率比较高，已经是一个被历史证明的事实。如何说明这一现象呢？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经济体制不够完善以及决策失误这样两个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两个原因在投资和积累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笔者无意否认。但问题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深层的、长期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本文以中国为实例，对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试图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积累、高投资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投资的机会成本

首先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投资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经济分析中的极其重要的工具。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是把一定资源用于投资时所不得不放弃的这些资源用于非投资用途时可能得到的好处。

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资本本能地具有一种积累和投资的冲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冲动却是以周期性的投资不足和经济危机表现出来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厂商和其他投资者在决定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投资规模时，除了赚取剩余价值和扩张资本的动力之外，他们还必须要考虑投资的边际机会成本，即边际成本。具体地说他们主要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利息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行情变化和其他的种种投资风险等等。这些机会成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和投资的硬约束。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情不同，经济体制不同，投资的机会成本与资本主义的机会成本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中，投资权主要是集中在中央和各级政府手中。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被看作为一个实体，金融市场只是作为这一经济实体内部的资金融通和管理机构，并不是独立于国家经济的、在实物投资之外并与之平行的另一投资场所或机会。此外由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都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在经济交往方面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的道路。虽然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往来，但是除了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外，对外投资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援助的性质，至少它们在经济上很难被看作是一种替代于国内投资的另一投资机会。由于这种国家在经济上的整体性和对外经济方面的封闭性，金融投资便不再成为实物投资的一种替代机会。在这一意义上，利息率也就失去了调节投资量的功能。国家作为一个投资实体不能期望向自己放债而创造财富，当然也就不在乎向自己借债而支付利息。

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作为对内高度计划、对外相对封闭的统一经济，在投资时似乎也不必顾虑投资的风险问题。尽管事实上计划不周和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也是一种风险，但

是与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相比，或者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形式的计划经济的投资风险的确是较小的。

然而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中，投资是不是就没有机会成本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问题是机会成本在这里都有了它自己的特点。如果撇开政府税收和少量的对外往来不谈，个人的全部收入可以用作消费和储蓄，企业的收入可以用作追加投资、消费或储蓄。在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条件下，个人储蓄和企业的储蓄全部转化为企业的追加投资。因此对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而言，全部国民收入就只有消费和投资两大用途。投资的增加来源于储蓄的增加，而储蓄的增加就意味着现时消费的减少。所以这里投资的机会成本就主要表现为由于投资或储蓄放弃的现时消费所带来的满足。

投资本身不是一种目的，投资的目的有很多种，对此我们在下面的投资收益中再作具体分析。但就目前分析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把投资的根本目的简化为创造未来的更多消费。这样，投资与现时消费的替代就可以看作是未来消费与现时消费的替代。投资的机会成本即现时消费的减少就可以看作是对未来消费的等待。

但是以现时消费所带来的满足的放弃作为投资或未来消费的机会成本要从数量上用基数直接计量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对投资结果的未来消费还是对作为其机会成本的现时消费的评价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它直接地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时间偏好、生活习惯，当然归根到底是由产生这一民族偏好和习惯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多种原因造成的。

由于我们无法对这种形式的成本直接进行计量，一种替代的办法是间接的计量。经济学家们已发现了多种间接计量人们评价的方法。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的办法是，问一下消费者在现有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下，如果再放弃一定单位的现时消费即增加一定单位的投资至少需要多少货币收入才能补偿。我们把这种人们要求的最低补偿、即人们对现时消费的评价记作 S 。由于人们对现时消费的评价是现时消费水平 C_0 和消费时间偏好 r 的函数，即：

$$S = S(C_0, r) \quad (1)$$

这样基期追加投资的总成本就可以写作：

$$\Delta TC = -\Delta C_0 S(C_0, r) \quad (2)$$

这里的 ΔTC 是追加投资的总成本， ΔC_0 是由于投资所放弃的现时消费。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把总成本改写为投资 I 的函数：

$$\Delta TC = \Delta I_0 S(C_0, r) \quad (3)$$

而投资的边际成本 MC ：

$$MC = \frac{\Delta TC}{\Delta I_0} = S(C_0, r) \quad (4)$$

从等式(3)和(4)可以看出，投资成本的高低是人们对现时消费评价 S 的函数。在国民收入一定时，投资水平越高，现时消费水平 C_0 就越低，而人们对现时消费的评价 S 就越高。在国民收入和投资水平一定时，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 r 越低，人们对现时消费的评价 S 就相对越低，因而投资的成本就越低。

就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绝大部分都是在经济上极其贫穷、商品生产和交换极其落后的国家中产生出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封锁中成长起来的。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这些民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满足现时的基本生活条件的实现和改善，对现时消费的迅速增长不抱有奢望，而对未来消费的增加给予较高的评价。这里传统的生活习惯、长期封

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农经营、小商品生产的思想、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造成的外来压力，以及执政的共产党对社会长期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等，都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对这些民族的消费时间偏好产生了影响。

以上分析的是传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中的投资成本问题。而70年代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由传统的模式逐渐地向分权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演进。在这样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下，投资的权力已不再集中在中央计划部门，而是不同程度地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地位比以前大为加强，与以前相比利率更为接近资金使用的社会机会成本；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开始出现，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比以前增加；对外经济往来发展比较迅速，近年来甚至开始进行了一些对外投资，等等。所有这一切经济体制的改革都使得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比以前相对增加。

然而不论经济体制如何改革，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制经济还占主导地位，企业投资的成本相对来说总是比较小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高度抽象、极度简单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它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是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变得更加复杂、更为丰富，它并不会使经济内容的实质有什么变化。就投资的成本问题来看，改革后的企业虽然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利益，要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但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财产仍然是公有的。因此，（1）投资的财源从根本上看仍然来自于国家。（2）投资的风险主要由国家或者全民来承担。虽然企业的职工也要多少分担一点投资的风险，但是由于企业是国有的，国家不会轻易让其倒闭、破产。即使“破产法”正式全面实施，职工在企业真正破产时面临的也只是暂时的失业和生活的不安定，而本来意义上的破产（即不动产产权的丧失）对职工来说根本是不存在的。（3）对企业来说，投资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相当于申请投资项目时所费的周折和口舌，而且这样的成本几乎只是一次性的。

总之，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特点，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未来消费的评价相对较高，对现时消费的评价相对较低，因此这里投资的机会成本即放弃现时消费的成本也较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率较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投资的收益

除了投资的机会成本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分析一下形成投资动机的另一个方面，即投资的收益。我们已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可以看作是一种未来消费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得越快，未来消费增长的可能性越大，投资的收益也似乎就越大。

但是我们这里必须要区别追加投资的未来总收益和投资的边际收益这两个不同概念。所谓追加投资的未来总收益是指由于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未来一定时期可消费总量的增加。我们可以用 ΔY_n 来表示与基期相比第 n 期国民收入的增加量。而 ΔY_n 又可以写作

$$\Delta Y_n = \frac{\Delta Y_n}{\Delta I_0} \cdot \Delta I_0 = (1 + R_n)^n \cdot \Delta I_0 \quad (5)$$

这里 ΔI_0 是指基期的追加投资，而 $\Delta Y_n / \Delta I_0$ 或 $(1 + R_n)^n$ 就是追加投资在第 n 年的边际投资效率（这里的边际投资效率是一种不太精确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考虑投资在基期和第 n 期之间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就我们这里的研究而言，这种简略不会使问题有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表述更加方便和简练）。考虑到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未来一定量的消费总是

要小于等量的现时消费，因此在评价未来消费额的增加时还必须将它用一贴现率还原为现值。这里的贴现率就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而未来消费增加额的现值就可以看作是投资的未来总收益。用 r 表示时间偏好，这样就得到投资的未来的总收益 TR 和边际收益 MR 的方程：

$$\Delta TR_n = \frac{(1 + R_n)^n \cdot \Delta I_n}{(1 + r)^n} \quad (6)$$

$$MR_n = \frac{\Delta TR_n}{\Delta I_0} = \frac{(1 + R_n)^n \cdot \Delta I_0}{(1 + r)^n} \cdot \frac{1}{\Delta I_0} = \frac{(1 + R_n)^n}{(1 + r)^n} \quad (7)$$

从这两个投资收益的方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的高低除了投资的边际效率之外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 r ，由于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者比较重视未来消费的增长，也就是说他们的时间偏好比较低，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投资的收益就表现得更高一些。（2）在作投资决策时，是把投资的边际收益作为主要的出发点还是把追加投资的未来总收益作为出发点结果是很不同的。随着投资的增加，投资的边际收益会出现递减趋势。投资增加得越多，追加投资带来的边际收益就越低。当投资的边际收益降低到与投资的边际机会成本相等时，投资的净收益最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从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中得到总的满足程度最大。但是超过这一点继续增加投资，由于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也即由于减少较多的现时消费来换取较少的未来消费，就会带来总投资效益或者总消费（=现时消费+未来消费）满足程度的损失。如果把这种总消费的满足程度看作为衡量投资效率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纯粹经济效率的角度看，这样的投资是得不偿失的。经济计划工作者如果把效率放在首位，就会力图避免这种过度的投资。

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投资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效率，或者说投资效率并不是头等重要的目标。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从而长期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和幅度，即投资的未来总收益^①。

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国民收入和长期消费的增长幅度作为投资的首要目标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而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般都表述为：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如果仔细地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暂时撇开文化需要不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所谓“最大程度地满足”“需要”，不应该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满足未来的需要，也应该包括现时的需要。因此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本身来看，要求的是在现时消费损失最小的前提下达到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总和的最大。这也就是说，追求的是经济的效率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或幅度。

以上两种不同的目的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这一矛盾实际上只是现实经济中矛盾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容纳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是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不发达阶段，由于下面的一些特殊原因，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投资的首要目标暂时地对准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速度或幅度而不是投资的效率。首先，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能否生存下去，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从心理上看来都直接地与能否迅速地增加国民收入和固定资本总量、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相联系。其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封建社会历史

较长的发展中国家，比较重视消费总量长期的增长。

除了上面两点在分析投资的机会成本时已经提到过的原因之外，这里还须强调一下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特点，即经济基础薄弱和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反映在投资问题上集中地表现为加速数很高。所谓加速数即资本系数，它表示平均生产一个单位的国民收入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而中国目前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技术水平较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有较大缺陷，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使得加速数相当高。因此为维持一定的产量就必须要有相当的投资。中国经济的另一个特点即人口众多，就它是一种可利用的生产性资源的角度看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长处。但是人口作为消费者，它需要大量的生活资料，即使作为资源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也必须要和一定量的物质资源相结合。因此从这一个角度看，人口又成了中国的一大负担。我们不得不保证一定的投资水平，创造出作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就业机会。据统计，1980—1986年的7年中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适龄人口平均为1528万人。假定新增加的劳动力适龄人口中30%从事工业，则每年工业要容纳450—460万人。再加上中国的高加速数问题，因而投资水平不能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具体来说，如果每一个工业就业人口需要投资10000元，则每年需要增加投资450—460亿元^②。而1982年至1986年我国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平均为470亿元，这说明在这期间高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仅能基本上满足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需要。因此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适度增长的需要，如果不进一步降低人口出生率 and 大幅度地提高资本效率，要把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降下来是不太可能的。

三、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以上分析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未来总收益。下面再把它们综合起来。

根据前面分析的投资的总成本和边际成本，在图1中画了两条不同的投资总成本曲线，它们代表人们对现时消费的评价不同时投资总成本的变化。 TC_1 代表对现时消费的评价较高时的投资成本函数； TC_2 代表对现时消费的评价较低时的投资总成本函数。对应于一定投资规模的总成本曲线的切线的斜率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 MC 。在投资规模一定时，如果对现时消费的评价较低，不仅总成本较低，边际成本也会较低。

根据前面分析的投资未来总收益函数，我们在图1中画了两条投资效率 $(1+R)$ 相同但消费的时间偏好不同的未来总收益曲线。 TR_{n1} 代表消费的时间偏好较低时的投资未来总收益曲线， TR_{n2} 代表消费的时间偏好较高时的投资未来总收益曲线。当消费的时间偏好较低时，同样的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未来总收益就较高，同时边际收益也较高。

在前面已经说明，当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追加投资所引起的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净收益最大，投资的效率最高。投资净收益最大的条件可以写作：

$$\frac{(1+R_n)^n}{(1+r)^n} = S(C_0, r) \quad (8)$$

这一等式的左边表示投资的边际收益，等式的右边表示投资的边际成本。而图中投资未来总收益曲线上某一点到投资总成本的垂直距离表示投资的净收益。

假定当消费的时间偏好一定时，投资的总成本和未来总收益为 TR_{n2} 和 TC_2 。这时如果追加投资等于 i_2 ，边际收益就等于边际成本，投资的净收益等于 $(tr_2 - tc_2)$ ；如果投资大于 i_2 或小于 i_2 都会引起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变化，而使投资的净收益减小。然而如果消费的

时间偏好 r 和对现时消费的评价 S 较低，总成本曲线和未来自收益曲线就可能从 TC_2, TR_{n2} 移动到 TC_1 和 TR_{n1} ；这样净收益最大的投资水平也就从 i_2 增加到 i_1 ，同时投资的净收益也随之增加到 $(tr_1 - tc_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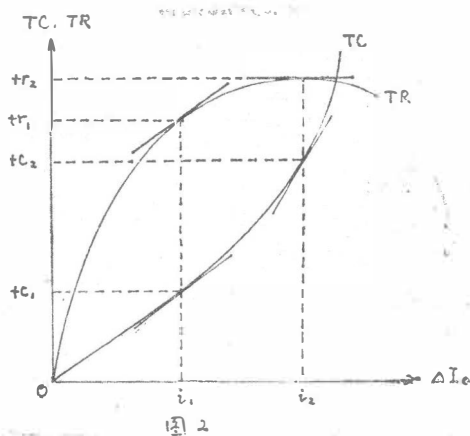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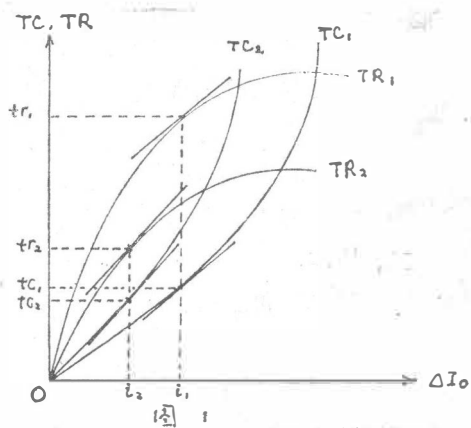
以上我们用公式和函数图的方式综合了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说明了在投资边际效率 $(1 + R)$ 一定时，由于消费时间偏好 r 和对现时消费的评价 S 不同，人们对投资规模的选择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消费的时间偏好较弱，对现时消费的评价相对较低，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投资规模都较大。

在本文第二节的投资收益分析中，我们还提到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暂时的经济、政治原因，在决定投资和积累规模时追求的不是净效率最大，而是投资的未来自收益最大，因此投资的规模就会更大。所谓投资的未来自收益最大，就是投资的边际收益为零，未来自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小于零，即：

$$MR_n = \frac{(1 + R_n)^n}{(1 + r)^n} = 0 \quad (9)$$

$$(\Delta TR_n)'' = (MR_n)' < 0 \quad (10)$$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投资就必须增加到相当大的规模，以致使投资的边际效率 $(1 + R)$ 等于零，或者使消费的时间偏好 r 趋于无穷大。这一特殊的投资规模的决定方式可以在图2中表示出来。投资规模等于 i_1 时，投资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投资的净收益最大。如果投资进一步扩大，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投资的净收益就会减少，但投资的未来自收益即国民收入和未来消费量却随之增长。当投资规模等于 i_2 时，投资的边际收益等于零，未来自收益达到最高点。追求国民收入和未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人们会把投资规模尽量地推进到这一水平，因而比追求投资效率时的投资规模还要更大。



①李柱锡：“如果有一种积累率能保证生产稳步增长，并使消费增长额达到最大值，那末，它就是最优积累率”，《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论》，第9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②曾霖康，《对我国通货膨胀原因的深层考察》，载《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石溢川，《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第3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